

# 印度共產黨——左派與右派

拉馬 著  
張虎 譯

自一九五八年起印度親匪與親俄兩派共產黨開便已醞釀有歧見，但是直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安德拉 (Andhra) 之德那里 (Tenali) 集會時始告公開決裂，此後，親匪共產黨採取了行動，經過一番審慎考慮之後終於決定要自印度共產黨中獨立出來。同年十一月左派共產黨在加爾各答 (Calcutta) 召開第一屆全印度大會，會中決定只有自己才是印度真正的共產黨。決議要以此自居，並自稱為「印度共產黨」。(馬克斯主義者共產黨)

右派共產黨同年年底在孟買 (Bombay) 也舉行了一次全印度大會。據會中之一報告稱「黨裏約有百分之卅之黨員已走附「分裂者」，乃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雖然如此，此數字仍是右派不實的估計，因為據左派稱他們在全黨裏佔有百分之七十之多數。同時，據另一報告「在各省之議會中二百零五名裏有七十二個名額親向左派，廿一名保持中立，只剩一百一十二名未會動搖。在勞克·薩巴 (Lok Sabha) 裏，卅二名中只有十六名未動搖，十一名已附左派，五名保持中立。」由此數字而觀，很顯然地黨的領導權已互相平分，而且黨內之多數已屬親匪之左派。

印度共產黨雖然分裂為二，而親蘇的右派却一直在為謀求兩派之合作而努力，為求達到此目的會不惜向左派修正態度。莫斯科方面之所以關心印度共產黨的聯合，原因是自從印度獨立以來，卡樂拉 (Kerala)、西班牙高 (West Bengal) 和安德拉 (Andhra) 一直是屬於親匪派的勢力範圍，而且這幾省的首腦人物多表現得積極親匪，與修正主義的莫斯科疏遠。由於此三省親匪之鑑，莫斯科當局頗有印度共產黨將有支離破碎之懼。

莫斯科方面的此種看法並非空穴來風，庸人自擾，一九六五年卡樂拉 (Kerala) 省之中間大選便是一實例，在大選中左派於八十四名席次中獲得

四十名，而親蘇派僅獲得三名，數字可謂相當懸殊。

雖然分裂已成，而莫斯科方面仍不顧一切地努力，以求兩派聯合。一九六五年七月蘇俄官方報紙「真理報」指出，印度共產黨的分裂已經很嚴重的削減了打擊「反動者」之力量。蘇俄為求兩派的聯合統一並不止於消極的呼籲，他更主動的邀請左派祕書長桑德樂牙 (P. Sunderayya) 前往莫斯科療疾，(桑德樂牙在其第一屆黨會後便被指控與中共合謀煽動印度的游擊暴動，可能印度政府便以此為理由將之拘留，但是為期七個月的「健康療養」後立刻便被釋放。) 桑德樂牙經過在莫斯科的一段療病後，對於莫斯科的觀點有了相當的瞭解，不過蘇俄仍不能有效地爭取到他的支持。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批印度共產黨頭子們 (包括中央黨部祕書，卡樂拉 (Kerala)、西班牙高 (West Bengal) 和旁遮普 (Punjab) 三省祕書) 聚集於莫斯科舉行會商並聽取指示。最後於會商結論中蘇俄共產黨敦促印度共產黨「致力國家共產黨團結和民主運動。」蘇俄的此一措施顯然是要配合即將來臨之第四屆印度大選。

一九六六年五月訪俄的代表頭子們攜著周詳的「聯合行動」計劃和非共黨之反國會左派返回印度，接着便展開行動，採取武力反抗國會的陣線。在此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在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間左派已經先組織了班高·班德 (Bengal Bandh) 並極力使當地社會秩序為之癱瘓，這些都證明了右派所有措施的失敗。一九六六年六月，右派採取暴力的方式在海德拉巴 (Hyderabad) 集會，要求甘地夫人辭職，並苛責她的內政與外交。同年九月在德里 (Delhi) 召集約五萬的人民集會，抗議貨幣貶值，物價高漲，對越戰問題失策等等，最後示威羣眾聚集國會門前要求甘地夫人辭職。且機 (Dange

向羣衆演說，他將示威比仿一連串的「罷工時裝表演」，而這種表演於未來的數月內將很快的蔓延至全國各地。

右派的反政府態度雖係爲了配合大選而加強，但是仍不能與左派在武力行動的方式上相比。其主要原因根本在於他們所採用之戰略與戰術各異。左派的態度是在批評國會政府的政策上從不妥協，在打擊「資產階級地主之政府」時完全採用暴力方式；而右派則是引用「和平的方式」來改變印度，並且與左傾的國會份子合作，此一武力陣線之採用完全是基於配合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需要。

由於彼此所採之戰略各異，在左派可以公然反對國會宣傳「革命」，而右派的一切行動却要受莫斯科滲透顛覆變面外交政策之影響，表面上仍須對印度政府表示友好。因此，當右派於去年五月採取武力陣線反對政府時，而蘇俄政府仍然與新德里保持着友好關係。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印度獨立紀念日，真理報讚揚甘地夫人主持政府六個月來的輝煌成就；而相反地，「人民民主」，左派官方週刊，立刻抓住弱點加以抨擊，認爲蘇俄的「讚揚」顯然表示是出賣印度的左派，更進而指責蘇俄之此舉表示了出賣共黨而支持國會的企圖。

雖然莫斯科一再呼籲團結，但是由於兩派間策略上所採方式各異，所以其努力仍是徒然。右派雖甚願與左派聯合，但是左派却拒絕其建議；左派對自己的實力頗有信心，因此他們認爲大選正可予以證明左派是印度真正之共黨的良機。

在卡樂拉 (Kerala)、催迫由拉 (Tripura)、阿薩密 (Assam)、和馬哈拉斯特拉 (Maharashtra) 四省兩派共黨有聯合陣線。在卡樂拉和催迫由拉兩省其聯合陣線是以左派爲主；在阿薩密和馬哈拉斯特拉兩省因爲兩派勢力均弱，所以雙方都需要建立聯合陣線；在安德拉 (Andhra) 勢均力敵。兩派共黨在五十多個的選區裏互相攻擊，結果兩敗俱傷。一九六二年安德拉共黨在省大會二百八十七個席次中獲得五十三個席次 (右派卅二，左派廿一)，到一九六七年他們只獲得十九個席次 (右派十，左派九)。在西班牙高 (West Bengal) 雙方採取各自爲政的方式，結果雙方在競爭中都失去了領導地位，雖然左派聲稱他們的領導地位高於右派 (左派四十三，右派十六)，而且他們是最大之在野黨，但是所發生的作用仍是意料不到的可憐。

由兩派共黨在安德拉 (Andhra) 的慘敗和在西班牙高 (West Bengal) 工作效果的大出意外，可以想像共黨在第四屆大選中所能得到的席次要比其他政黨少些。無論是左派抑或右派都不可能再在勞克·薩巴 (Lok Sabha) 中成爲最大政黨，因爲在勞克·薩巴裏有五百廿一個席次，兩派共黨加起來也不過只佔四十二個席次 (右派廿三，左派十九)，與曾經爲最大政黨之斯瓦炭特拉 (Svatantra) 的四十四個席次的記錄相比仍尙少二票。(一九六二年，共黨曾在勞克·薩巴中獲得卅二個席次——右派十六，左派十一，中立五)。共黨勢力在八個省的議會裏略有改進，而在其他各地情況則依然如舊，有些甚至尙較前有所減。

由於大選的結果，兩派共黨競爭日熾。右派在勞克·薩巴中領先四個席次，在各議會中只獲得一百廿二個席次，左派在各議會中却獲得了一百廿七個席次。在卡樂拉 (Kerala) 西班牙高 (West Bengal) 馬德拉斯 (Madras) 三省左派力量較強，而在其他省份則右派較強。一般而言，左派勢力在鄉村，右派勢力在城鎮，究其分佈原因實係因爲彼此採用策略不同之故。左派慣用中共之方式，工作對象爲農人，手段是武裝暴動；右派希望以和平方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爭取都市工人和中產階級，所採用手段是滲透顛覆政府當權階級。

共黨在勞克·薩巴中一九六二年獲取卅二個席次，到一九六七年增至四十二個席次；在省之議會中一九六二年一百九十九席，到一九六七年增至二百四十六席，但是，實際上投票率却減少了百分之零點八 (一九六二年百分之九點七，一九六七年百分之八點九)，究其原因無非是其他反對黨之百分率增高之故，因此共黨的投票率雖然減少不多，但是比較起來却已可觀。此種現象正象徵着共黨勢力近年來雖日漸增強，而在組織上仍極薄弱，雖然共黨已在其他各方面爭得了優勢，仍不能把握國會之弱點予以痛擊。

大選甫畢，共黨失利，兩派便展開互相指控，彼此指責破壞團結，將大選中之失敗歸過於對方。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左派共黨政治局指稱：「在許多方面的失敗都是修正主義黨都有意的將反對政府票加以分離的結果，修正主義的此舉完全是盲目的，愚笨的。」在同一天桑德樂牙 (Sunderya) 與記者談話指責右派根本不是共產黨，「我們承認他們只是且機 (Dange) 的一夥同路人而已，只有我們才是真正的印度共產黨。」

同時，且機(Dange)也發表談話：「印度共產黨之分裂責任根本不在我們。」他批評左派的行為是「胡鬧」。右派共黨中央秘書長於「新時代」雜誌中發表談話指左派目前的行為是「誹謗和謊言」，企圖「在共黨運動中使自己成爲唯一的黨派。」

由於外界日增的壓力，致使共黨兩派都樂意在勞克·薩巴(Lok Sabha)中和各省議會中採取聯合的態度。在印度含有共黨的省份計有五省(卡樂拉(Kerala)、西班高(West Bengal)、比哈(Bihar)、聯合省(U.P.)、旁薩普(Punjab)。在這些省份裏都有右派參加聯合政府，而左派却只參加了卡樂拉(Kerala)和西班高(West Bengal)兩省聯合政府，因爲在此兩省內左派是反國會黨派中之最大黨，他們可以控制聯合政府，所以他也就樂意參加了。

當兩派鬥爭激烈的當頭，蘇俄當局態度非常慎重，不作任何之批評。大選期間蘇俄廣播電台(包括莫斯科電台，前進和平電台，塔斯克 Tashkent 電台)對於投票情形會有表示，關於此項表示，印度官方認爲是「審慎而有目的的」，蘇俄電台於指責美國干涉大選時盡量使自己表現得無可指責。使自己表現得是親國會親左的立場。蘇俄此舉的目的在促使國會黨的「激進份子」指責國會中一些領導人物爲「反動派」(如毛拉機 Moraji、德撒 Desai、S.K. 帕提爾 Patil等。)在國會議員打擊共黨候選人的地區(無論左派或右派)，蘇俄均予以公開的支持，讚美他們是尼赫魯的追隨者。(印度政府對此頗感滿意，印度駐莫斯科大使克瓦奧·新 Kewal Singh 特此呈遞國書以表謝意。)——印度時報一九六七年六月廿三日。

蘇俄對於印度共黨會投下不少之人力與財力，但是對於當前共黨的工作却非常失望，雖然在卡樂拉(Kerala)略有收穫，而對於斯瓦炭特拉(Swatantra)和堅恩·散恩(Jan Sangh)之勢力頗爲煩惱。因此莫斯科仍繼續不斷地爲兩派聯合而努力。今年二月廿五日莫斯科電台特別強調共黨在卡樂拉(Kerala)之成功，認爲此項成功是「共產黨兩派步調一致互相合作的結果。」三月二日於另一項南亞計劃中指責中共不合作時說：「印度共黨若不是中共的搗亂是很可以聯合起來成爲國會中的第二大黨的，而且所得席次也將兩倍於今天。」二月廿七日蘇俄國際電稱：由於共黨內部的不合作致造成了斯瓦炭特拉(Swatantra)和堅恩·散恩(Jan Sangh)等右翼黨派之建

立，此二人之主要勢力在奧里薩(Orissa)和德里(Delhi)，他們的得勢是印度今天政治行情的一項驚人發展。

北平當局不若莫斯科之熱衷於大選之成敗，他們的目的是在製造印度社會之不安。爲求配合此種措施，一九六七年二月廿日中共新華社宣稱印度大選「已於混亂中結束」。他們會對印度大選作下面的評論，但是並未表其屬於那一派共黨。他們認爲「國會黨在卡樂拉(Kerala)之大選中完全失敗，這完全證明了印度人民反抗暴政的浪潮是所向無敵的。」同時又一再強調「印度大選只是資產階級哄騙人民的把戲，資產階級假民主的藉口，絕對不能代表印度人民之民意。」

從莫斯科和北平對於印度共黨的作法以及印度政府之態度，可以窺見印度左右兩派共黨在本質上和特性上之差異。左派在思想上極其親匪，而莫斯科却欲將之挽回，在左派陣線上爭取大批共黨。因爲蘇俄知道左派之中份子並不統一，其中包括有瘋狂之親匪份子，暴力革命的信徒，中間份子(如 E. M. S. Nambudiripad)，這些中間份子之所以反對右派乃是因爲對於右派之「修正」和「改革」主義起了厭惡，可是對於全面性的武力反抗國會態度却仍猶疑。莫斯科希望能與親匪份子，暴力革命信徒以及其他左傾之可以說服派系聯合，莫斯科之如此作法是有決心的，寧可向暴力路線修正也要爭取聯合。據現在情況觀察，已有一些親匪份子自左派中分離成爲一個第三集團，如果此一分裂是事實，左派走向聯合路線之可能將可預期，即便組織上仍各自獨立，行動上對步調一致。

### 國際關係研究所叢書

## 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

汪學文著

全書十一章，五十萬言，二十五開本，八二八頁。

平裝一冊，定價新台幣貳佰元。

軍警學生五折優待。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地址：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

電話：三四八〇二

郵政劃撥賬號：三四三六號